

“文澜学术文库” 系列丛书

Xiandai Hanyu Yu Xiandai Hanshi Guanxi Yanjiu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朱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澜学术文库” 系列丛书

Xiandai Hanyu Yu Xiandai Hanshi Guanxi Yanjiu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朱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 / 朱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161-2347-8

I. ①现… II. ①朱… III. ①现代汉语—关系—新诗—研究—中国 IV. ①H109.4②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3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邢耀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资助 [2009065]

总 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建院虽然只有八年，但院内新闻系、中文系和艺术系所属学科专业都是学校前身中原大学 1948 年建校之初就开办的专业，后因院系调整，专业中断，但从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开始其学者生涯到当代学者古远清教授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台港文学研究，本校人文学科的研究是薪火相传，积淀丰赡。

1997 年，学校重新开办新闻学专业，创建新闻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4 年，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组建成立。近年来，在学校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文社科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2007 年和 2008 年，中文系和艺术系又相继成立，人文学科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检阅本院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我们从今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文澜学术文库”。

丛书以“文澜”命名，一是表达我们对老校长范文澜先生的景仰和怀念，二是希望以范文澜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精神为楷模以自律自勉。

范文澜先生曾在书斋悬挂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做学问的自律精神在今天更显得宝贵和具有现实意义。《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而立之年根据在南开大学的讲稿整理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之

作序：“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学术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贵在传承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范文澜先生之《文心雕龙讲疏》后又经多次修订，改名《文心雕龙注》以传世，作者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为吾辈楷模。正因如此，其著作乃成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集旧注之大成、开新世纪之先河的里程碑式的巨著。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是为序。

胡德才

2012年4月8日于武汉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一 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1)
二 现代文学中的语言学研究	(7)
三 现代汉诗中的语言研究	(12)
第二节 “现代汉语”辨析及其文学意义	(15)
一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	(18)
二 现代汉语与普通话	(25)
三 现代汉语与欧化	(30)
第三节 “现代汉诗”概念辨析	(33)
一 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	(33)
二 从“白话诗”、“新诗”到“现代汉诗”	(37)
第二章 白话与现代汉诗	(41)
第一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诗性考辨	(42)
一 声音中心主义、文字中心主义与诗性	(43)
二 工具性、(思想)本体性与诗性	(51)
三 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与诗歌语言	(58)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诗性的轻慢及后果 ...	(65)
一 对诗体的轻慢	(66)
二 对诗语的轻慢	(69)
三 对诗情的轻慢	(74)

第三节 白话的诗性空间	(78)
第三章 欧化与现代汉诗	(85)
第一节 欧化对诗形的冲击	(89)
一 对外形式的冲击	(90)
二 对内形式的冲击	(96)
三 形式建设探索	(101)
第二节 欧化对诗味的消解与重构	(105)
一 精密化	(108)
二 语法化	(122)
三 逻辑化	(132)
第四章 文言与现代汉诗	(144)
第一节 文言的形成及特点	(144)
第二节 文言的诗性问题	(153)
一 文言的意象性与意象	(153)
二 文言的非线性与倒装、炼字	(160)
三 文言的偶值性与对仗、互文	(168)
四 文言的离境性与典故	(172)
第三节 文言与现代汉诗	(177)
一 非线性用法	(184)
二 新意象的创立	(193)
三 典故的化用	(200)
第四节 现代古体诗词的入史问题	(202)
一 进不去的历史	(203)
二 解决古体诗词入史问题的可能路径	(206)
第五章 “口语写作”与现代汉诗	(212)
第一节 后新诗潮的语言观	(212)
第二节 口语化写作的诗学特点	(222)
一 反意象	(230)

二 叙事化	(235)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之争的 语言学实质	(238)
第四节 “口语写作”的歧途及走向	(245)
一 “梨花体”	(245)
二 “下半身写作”	(251)
三 “垃圾派写作”	(252)
结语	(256)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70)

第一章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如果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就无法否定文学和语言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雷·伊格尔顿在考察文学的定义时发现，“文学的可以定义并不在于它的虚构性或‘想象性’，而是因为它以种种特殊方式运用语言”^①。无论将文学看做什么，语言都应该是文学最核心的要素。因此，语言问题自然也应该是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关键的切入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从事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人看来，文学是文学，语言是语言，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交集。葛兆光很早就指出，“现在中国的语言学与文学之间，常常像睦邻一样友好互不侵犯，也像陌生人一样隔膜互不越界”。^②葛兆光是在20多年前发出这番感慨的，但直到今天，情况不仅没有丝毫改观，而且似有加重迹象。郜元宝也有切身体会：“在我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的专业布局中，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一向隔膜。

^① [英]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我有时纳闷，为什么非要把研究中国语言的人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放在同一个学术单位呢，既然他们这样老死不相往来？”^① 郜先生说的当然不是搞语言的和搞文学的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学术上这两个领域的人总是各自为政，缺少交流、借鉴、融通。相信无论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专家，对这一现状大概都不会反驳、否认。从语言学的角度（不仅是对文本进行语用、修辞的微观研究，而且是从语言哲学、理论语言学甚至符号学等视角进行宏观研究）研究文学本应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但是，就现状而言，二者似乎是分门别户，不相往来：语言学研究将重点放在字、词、句、篇及语法规则上，对常常偏离甚至有意冒犯语法规则的文学语言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有意回避，语言的“文学性”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学研究也基本不理睬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大多将重点放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上，视阈宏大，眼界高远，但终不免隔靴搔痒，以空对空，总让人产生“这还不是文学研究”的疑问。

以文学史研究为例，如果不考虑语言、文字本身对文学演变的影响，古代文学史则每与朝代更迭紧密相连，现代文学史则与文化思潮冲击挂钩。文学虽与时代相关，但并非文学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政权更替常发生在一夜之间，语言、文学却并不会如影随形，立即改头换面。事实也是如此：唐诗并没有在唐亡的那一年刎颈，宋词也没有在宋灭那一天投江，元曲也没有在元终的那一刻噤声。缺乏语言意识的文学史研究，便会“每由立场的不同而异其区分，或重在历史的背景，或重在文学的关系”，但是“由文学之性质而言，论情感则今古如一，论想象与思想则又各

^① 郜元宝：《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人不同，并不一定受时代影响”。^① 也就是说，从立场、历史、情感、想象等出发研究文学都没有抓住“文学的性质”，只不过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当然，外部研究并非毫无益处，但不应将本来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问题排挤出去，独占文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世界观深埋在语言结构之中。语言分析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深层结构分析。如果文学不研究‘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那么这种文学研究就将文学的根本置于不顾。”^② 近些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虽高，但重写出来的文学史仍多是用“时间”这柄利刃，夏、商、周，元、明、清……强行将文学按朝代切割成长短不等的时间段，浑然不顾被切割对象撕心裂肺地叫疼。

不以时间断代，而以“体制”相分，是文学研究的又一路数。这样的研究离文学本身当然是近了许多，但从具体研究成果看，又“不免过涉抽象，而且有时也不免过于琐碎”。所以，“为欲求其具体”，“不如重在构成体制之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语言文字。“所以我的看法，认为文学的基础总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③ 郭绍虞的这篇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是最早有意地从宏观语言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将文学研究的着眼点放到了文学“构成体制之工具”上，属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自然最接近文学自身。“文学的基础总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结论并不新鲜，与人人耳熟能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论断大同小异，但事实却是，我们高喊着“重视语言”的口号，却少有人真的

① 郭绍虞：《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490页。

② 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③ 郭绍虞：《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490页。

去从“语言文字”这一“文学的基础”着手进行研究。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黄子平所观察到的那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当把语言放到‘最后’来谈的时候，无非是把语言的处理方式当做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把语言作为外在于文学的体系来看待，因而，文学也外在化了。更多的，连这‘最后’也没有。蔑视语言是要受到语言的惩罚的。”^①这番话真是切中肯綮，也引起了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加上当时英美哲学宣称的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哲学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进入语言论阶段。受此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批“语言意识觉醒”了的文学家（主要是小说家和诗人）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语言文体试验，批评家也开始留意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反思及理论清理；同时还有一批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也开始对文学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文学性进行深入的探讨。

黄子平先生的这篇题为《得意莫忘言》的文章发表在 1985 年的《上海文学》第 11 期，是最早提出“文学语言学”这一概念的文章，它认为“它不仅研究‘语言的文学性’，而且更注重研究‘文学的语言性’。前者在‘旧有的批评框架’中只处于‘最后’的卑微地位，后者在‘新的理论学科’中却成了最根本的出发点”。作者认为，在新的文学批评学科构建中，应设专门的“文学语言学”这一根本区别于“旧有批评框架”的“新的理论学科”，将“文学的语言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点。即使今天看来，该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启发性。但也许当时的文学研究者多将注意力放在时代变动所带来的新现象、新思潮上，应者寥寥，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① 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 年第 11 期。

1990年鲁枢元出版了专著《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①期望建立一门“文学言语学”,用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和“流变性”对抗结构主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的“科学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不忘“汉民族的母语”,对汉语的诗性进行了深度阐发。此书出版后,文学研究界评价甚高,作家王蒙、韩少功与作者就此书的通信发表在《读书》、《作家》等杂志上,王蒙对该书的评价是“别树一帜”,“填补了创作心理研究这个几乎很长一段时间是空白的领域”^②;韩少功也毫不掩饰其溢美之词,说“这本书分量很重,是国际级,足可以‘西渐’入侵欧美”,并指出“在这个时代,能用心灵与血性来创造学问的实在不多”。^③理论批评家南帆、白烨(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发表了重要文章对该书进行评析,白烨更直接称这部书为“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然而,就在文学界一片叫好之声时,语言研究界却对鲁枢元的“跨界研究”表示出了明显的敌意。语言学家伍铁平、孙逊发表《评〈超越语言〉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一文,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语言学方面,作者缺乏基本功,以致信口开河,错误百出”,而且由语言问题进而还连带牵出了对该书作者治学态度的怀疑,“鲁枢元同志并不像白烨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甚至将矛头直指此书的编辑与出版者,“这件事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国家科学殿堂的社会科学院,其下属的国家一级出版社,是否将这本书送语言学家审阅过,为什么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白烨对这本书要那样推崇备至呢?这是不

① 此书于2011年由学林出版社再版,更名为《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语言学》。

② 王蒙:《缘木求鱼——读鲁枢元的〈超越语言〉》,《读书》1992年第1期。

③ 韩少功:《韩少功致鲁枢元信》,《作家》1993年第11期。

是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某种不正之风呢?”^①今天再读这些不无偏激的文字,总有疑问在心:不就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至于这样吗?从两位语言学家的痛斥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到领地被“外敌”入侵的焦虑与不安。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文学与语言学之间的畛域的确是难以跨越的。

重要的理论文本还有马大康的《诗性语言研究》,该成果“从新的理论视角,将人、语言、世界视为多维度的存在,由人、语言、世界之间关系的多向性和多变性,以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出发,深入探讨诗性语言问题”,试图从语言的角度真实地把握原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味、诗性。作者也确实在“努力打通哲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化人类学诸学科的界限”,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海德格尔的“家园理论”及“能产性/限制性语境理论”,对诗性的生成给出了深入全面的解释。上述研究主要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从哲学层面进行的研究,理论资源多来自西方,解构“结构主义”,缺乏对特定语言形态,尤其是汉语的观照。

总体而言,近二十年的文学研究确有向语言转向的趋势,但由于学科隔膜,“出手大气、阐发精深的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同类研究中稚嫩的声音、故作玄奥的哲思、隔靴搔痒的分析,很难见出学术含量和智慧含量。”^②所以,文学语言学虽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片“迷人的海”,但如果不打通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森严壁垒,提升理论素养,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仍很难有所突破。因为,“文学语言研究至少需要语言学和文艺美学的

^① 伍铁平、孙逊:《评〈超越语言〉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外语学刊》1993年第2期。

^② 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双重经验。文学语言研究只有在语言系统和文学系统的参照中，才能进行更有解释力的论证。以文学语言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出自语言界，还是出自文学界，都不能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科经验的自我认证。”^① 所以，要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创造，不用“心魂与血性”是做不到的。

二 现代文学中的语言学研究

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其实质就是要在文学实践和文学研究中将文学与语言（国语）结合起来。他写的《白话文学史》始终用语言（白话）来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虽带有那个年代固有的过度的偏激，但其研究思路却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发。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思潮研究、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后，于20世纪80年代末重返语言研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汹涌而至的“泛文化研究”再次将文学的语言学研究边缘化。所谓“泛文化”，即利用“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性别研究、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狂欢理论与广场文化等理论言说”来研究文学，^② 各派时髦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一派繁荣景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时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虽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宽度，也开掘了文学研究的深度，但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文学研究。忽视文学的本质、本体会让文学研究最终成为“无根”的研究，其研究的合理性甚至学科的合法性都将遭到怀疑。美国学者J. 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中宣称“文学的终结

① 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姚朝文：《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就在眼前”，因为“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已经‘不合时宜’了”。^① 米勒在这里带有警告意味地提醒我们，如果将文学研究的焦点散放在文学以外的东西上，而忘记语言这一研究核心，文学研究迟早会被其他研究所取代，最终消亡。

语言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确立是以白话文运动作为开端和最终追求的。如果没有文学语言的新变，也就不可能有现在这种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现代”文学。因此，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语言研究应该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涉及对文学变动根源的追问。其实，只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像“五四”这样如此激烈的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必须发轫于一场“语言运动”（白话文运动），而不是相反，就可以察觉语言绝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工具”，对整个社会尚且如此，何况对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面对大量的理论难题，有的甚至是现代文学根基性的难题，例如，何为“现代文学”？何为“现代”？如何确定其起讫？……这些问题目前仍未找到统一答案，但有些共识正在逐步达成。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并非断裂性的两种文学存在，而是有着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内在关联，“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的观点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二是认为，“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最大、最明显的区别正是源自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区别。这一观点的重要成果是教材《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出版。该教材于2007年初版、2010年再版，书名由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名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体现了对“中国现代

^① [美]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